

崔健欣赏年轻人直接和真实的锐气：

我的思想和年轻人一样

谈与年轻人互动——跟年轻人互动的时候,频率高一点;跟同代人互动的时候,频率低一点。

谈读书和未来——“你没有必要读书读破万卷,很多历史是没有用的。你应该去畅想未来,仰望星空,你应该有创造性的未来,我觉得这才是年轻,因为你不怕犯错误。所以真的没必要听老人在那忽悠,造成年轻人对自身价值的一种怀疑。”

谈《1942》与少年派——“你就是那个逃难的难民,你只不过有点儿钱而已,生活在一个好时代而已。”



崔健

除了大卫,他对不少新乐队、歌手也如数家珍。聊起时下的潮流,他主动提起了对富二代、“求包养”这些热词的鄙夷。

崔健:我的思想跟年轻人一样

记者:据说你现在还是很喜欢跟年轻人在一起,去看他们的演出,跟他们沟通,是吗?

崔健:嗯。

记者:可能现在那些跟你同年龄的人,反而就不太聊得来?

崔健:是的,我们的状态不一样,比如说他们有孩子,有社会的压力,有自己的工作关系,一系列的事儿。他们大量想的事儿,已经不是年轻时候的想法了。他们关心的问题,和我歌里唱的已经完全不一样,我最新的作品他们也听不懂在唱什么。而我的工作状态和生活状态,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,也还是像年轻的时候一样,我的思想方式还是像年轻人一样,所以会有一些前不着村,后不着店的感觉。双方都有可及之处,都会觉得我们是他们的人,但是都会有一种疏远感,所以这一种也是若即若离吧。

年轻人里面,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跟我能够互动起来,甚至可能绝大部分人也不喜欢,甚至听我的名字就拒绝跟我互动,屏蔽掉我的信息了,就觉得你岁数大了,凭什么代表我们?我们希望看到跟我们长的一样的人代表我们,这是很自然的。这个我

没有想强加于市场什么东西。当你自然地互动,得到结果的时候,你偶尔会发现,原来这些年轻人和那些老人是一样的,只要你跟他们互动起来,实际上他们的感受是一样的,我们之间就没有了代沟的感觉。所以我说,我跟年轻人互动的时候,频率高一点;我跟同代人互动的时候,频率低一点,但是一旦有的话,会很有质量。

崔健看待年轻一辈:

记者:跟同龄人聊什么事会有共同语言?

崔健:聊一些社会问题。跟年轻人互动,聊到恐惧的时候(也会),年轻人也有恐惧,但年轻人的恐惧和我们的不一样,但是当年轻人也有跟我们一样的恐惧的时候,我发现也能够聊起来。

记者:你现在的恐惧是什么?他们的恐惧是什么?

崔健:我觉得年轻人的恐惧是,他对物质文化已经麻木。当他对社会环境和生活质量感兴趣的时候,他就会发现,我们有共同语言。他就会接受我,他甚至会觉得我更厉害,因为我爆发的东西更多,甚至会觉得有点儿崇拜我,渴望交流,把我当成老师。当他没有这种要求的时候,他们就会觉得,你们老人太沉重了。所以这些时候我觉得有一种责任,因为我觉得年轻人没有超过老人,也是老人的失败。所以说我也希望年轻人有更多的东西出来,这个东西对于上一代人来说,也是一个乐趣,我们从本质上就愿意跟年轻人多说一点。跟岁数大的人交流,多少会有一点抬杠的感觉,有的时候对方不同意我,但当他在肯定我的时候,我会觉得有一些力量的转换,会给我带来一种怀疑:有没有必要跟他交流?即使把他说赢了,我有什么好处吗?有什么意义吗?

记者:这种心态听起来有点儿像年轻人可能开始对你的心态,可能有时候会觉得你在抬杠,说你功成名就,肯定不会放下架子来跟我们聊天。

崔健:对,碰到年轻人的时候,他们叫我崔老师我都烦。我说我讨厌这样叫,你以后叫我“你”吧,别叫您了,叫我老崔、崔哥都可以。完了以后,我跟他们交流,他们就会把自己的想法亮出来,之后有些我的东西他们就会接受。比如我的确特别不喜欢富二代,花的比挣的多。我跟他们说:你应该对你父母尊重点儿,不要以为这是父母爱你。还有什么包养文化,我觉得也是毁年轻人的文化。这些话对年轻人有效,等他们自己努力了,开始真正找工作了,他们会觉得这样的生活更快乐。

我觉得年轻人有非常深刻的思想,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优势:很多别人通过很长时间去琢磨透的一些事情,他通过看一本书就看明白了。但我认为你没有必要读书读破万卷,真的没必要,有很多历史、很多过去的经历是没有用的,我真不希望年轻人去看、去接触,任何在销毁你生命能量的那些知识,你都可以屏蔽掉。你应该去畅想未来,仰望星空,你应该

有创造性的未来,我觉得这才是年轻,因为你不怕犯错误。所以真的没必要听老人在那忽悠,造成年轻人对自身价值的一种怀疑。这一点我特别讨厌。

一场电影引发的思考:

记者:你的电影《蓝色骨头》,明年初确定能上映了吗?感觉这部电影经历了很多波折。

崔健:如果政审没问题……这是一样的问题,我们和年轻导演真的是面临一个同样的问题——一个乌纱帽政治管理的文化体制管理。中国的文化政治全是被动于经济的,中国的文化还没有开始改革呢,只要有审查制度……当然审查制度是必要的,但是我觉得,只要电影局、文化局都应该归属到工商税务的一个部门就完了,让他们拿着法律去管理这些,去收税就完了,它不应该提出一些非常奇怪的问题去管理这个,那中国的艺术没法发展,中国的想象力没法得到保护。这帮人怕的是丢官,他怎么管艺术?他懂艺术吗?所以很多人对很多的艺术家批判是不公平的,因为他们没有自由,他们只能拍出市场需要的东西。

现在你们只能看《失恋 33 天》,觉得“这是我们年轻人的电影”。真正的好电影,年轻人老人都能拍出来,不是拍不出来,是没法拍。好多好电影呢,好多好的故事,我相信你们这代年轻人也有这样非常有才华的人。但是你们会发现,他第一部片子还可以,第二部片子怎么变成这样,第三部就完了,基本上都是这样。

记者:现在有两部电影讨论比较热烈,《1942》和《少年 PI 的奇幻漂流》,你看了吗?

崔健:看了。

记者:有什么感触?

崔健:一谈到具体的事儿,就容易变成另外的东西,我觉得特别是我,应该负责地说话,所以我对片子的喜好,我在私下里说得特别清楚,但是在媒体上不好说。所以我从抽象的角度说一说我的观点就可以了,我不愿意说得太具体。看李安片子激发了我的创作,我自己也想拍电影。看冯小刚的电影,激发了我对中庸的哲学更深的批判,我恨极了所谓的中国的儒家文化,中庸文化,造成了在关键的时候政治昏庸无能,贪腐一家,庸官就是贪官。这种情况就会造成这个民族在关键时候土崩瓦解,完了我们的民族,我们的后代,仍然有危机感,被别的民族欺负,仍然有。我甚至觉得上街砸车的那帮人,如果日本人进来,他们可能就是汉奸。

记者:早跑了?

崔健:不是早跑了,他们这帮人可能拿着旗子去拥护日本人,完全没有抽象的理性思维方式的能力。这种长期没有一个理性思维的群体,这种因为一个统治者长期不被约束而产生的巨大的贪污腐败的群体,到关键时候,就是出卖民族、毫无能力,只能自相残杀的群体,这种文化从各个层次都能看到。我看完这个片子就有这种感觉,就很愤怒,我觉得中国的年轻人仍然有这样的危机。赶紧醒过来

吧,赶紧去强大这个民族吧,赶紧去反腐败吧,那些腐败的庸官根本就不爱这个民族。

记者:冯小刚前阵子也说,中国人有些恶是胎里带的,这个你怎么看?

崔健:那是刘震云写的书,还有一些东西他不敢拍。我觉得,有些东西是你没必要看到的,它们就是对你的能量产生消耗,这个片子里的这种东西,鲁迅早就批判完了,没必要再知道中国人的秉性了,这种缺点你根本没必要再看了,你已经知道你自己有了。但是你要是看完了片子,你必须得愤怒,你愤怒的话就应该去做点儿事儿,否则的话,拍这个片子干什么?你见到这帮腐败分子无动于衷的话,看这个片子干什么?

我看片有一个特别大的感悟:电影放的时候虚焦了,因为我是被挤在一个最里排的座位,实在不愿意去影响别人,要不然我就找他们经理去了,若干次我都想喊起来,说你们电影虚焦了,你们应该对观众负责任,我们花钱买票进来。没有一个人站起来,后来我这么想,所有人都跟电影里面被欺负的难民是一样的心态,没有人去敢说这个电影虚焦,字幕都看不清,都是虚的,我看完都头晕了。

而我前一天看的《少年派》,颗粒特别清楚,焦点特别硬,也可能人家有要求,因为这个虚焦的东西,可能不是一道工序能解决的。后来我看完出门时跟他们工作人员说,你们电影虚焦了,你跟你们经理反映一下——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儿。按道理我都应该站起来,说你们虚焦了,你应该退钱。因为电影如果焦点不清楚,视觉上的东西变差,震撼力就减低了。这就是习惯,就是中国人为什么没有人站起来,没有人管这事儿。(腾讯)

崔健其人

崔健,1961 年出生于一个朝鲜族家庭,父亲和母亲都是文艺工作者。从 14 岁起,崔健跟随父亲学习小号演奏。1981 年,他被北京舞蹈团招收为小号演奏员,开始了他的音乐生涯。1978 年在北京交响乐团担任小号演员,直至 1987 年离开。崔健被誉为中国摇滚乐开山之人,有“中国摇滚教父”之称。

成名曲为 1986 年的《一无所有》。代表作有《一无所有》、《最后一枪》、《新长征路上的摇滚》、《给你一点颜色》等等。自 1990 年代中期以后,崔健逐渐淡出中国歌坛,但是在 2005 年一张向崔健致敬的专辑《谁是崔健》,再次证明他在中国摇滚界举足轻重的地位。

2000 年 12 月 12 日,由荷兰大使颁发的克劳斯亲王最佳成就奖评委对崔健作出评价:与中国的社会文化紧密相联,摇滚音乐家崔健表达了中国和世界青年的心声。在他的音乐创作中,崔健借鉴了中国传统诗歌的表现形式,并立场鲜明地反对西方音乐的影响。(腾讯)